

阿佤山的音符

■ 剑 钧

甩动长发,动感十足。从他们的舞姿中,他感受到了阿佤人热爱生活、崇尚力量的情怀与胸襟。

1964年,一个偶然的契机,杨正仁在班哲寨听到一首旋律优美,节奏又很欢快的佤族民歌《白鹇鸟》,兴奋得像个小孩子欢跳起来。他早就想写一首表现阿佤人热爱新生活、歌唱新生活的歌曲。为此,他夜不能寐,连夜起来,以此为蓝本开始了新歌创作。为了烘托气氛,他将原民歌的旋律音高提高了“八度”,在歌词上也做了反复推敲。一个月来,他白天工作,晚间写歌,在吟唱中反复修改歌词和曲谱,一直改到满意为止。歌出来了,先是由部队宣传队排练演出,西盟县文工队闻讯后也将曲谱拿过去,到佤山村寨演唱,很快就得到阿佤人的喜爱。他们边唱边跳,称之为“咱阿佤人的歌”。这首歌没多久就成了西盟佤山的“流行歌曲”。那年,杨正仁回家探亲,一进昆明城,猛然发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自己写的歌,顿有始料未及的惊喜。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演唱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电波也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中国有个阿佤山,阿佤人民爱唱新歌。

我禁不住油然而慨,杨正仁是何等幸运,若没那段难忘的佤寨生活,若没接触到那么多佤族歌舞和乐器等原生态素材,他也无从创作出这首曾经响彻中华大地的经典名曲了。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此话不虚!

二

遐想中,我耳边骤然响起这首熟悉的歌。歌者是同行的普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她望着车窗外的佤山风光,触景生情地哼唱起来:“村村寨寨,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随即满车的人都跟着唱起来:“毛主席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

这首歌当年很快就成了佤山村寨最受欢迎的歌。1965年3月,在西盟佤族自治县成立庆典晚会上,阿佤人围着篝火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载歌载舞,一直跳到破晓时分还意犹未尽。

此后,这首歌让和我同时代的人认识了远在西南边陲的阿佤人。我依稀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内蒙古农村插队。一天,生产队的大喇叭里放出了《阿佤人民唱新歌》,瞬间便让在田头小

憩、与村民聊天的知青们沉静下来,那欢快的旋律竟一扫身上的疲劳。从此,在上工的路上,我们时不时地唱起这首开心的歌。一首歌的音符就这样拉近了南疆和北国的距离,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阿佤人喜欢这首歌是发自内心的,2002年,西盟县将《阿佤人民唱新歌》确定为西盟县歌。”同行的副部长动情地说,“知道为什么喜欢吗?因为这首歌释放的是翻身阿佤人的真情实感。”

在佤山村寨,我对这话的理解加深了。曾几何时,佤族这个古老民族还生活在竹木草屋,还离不开靠野菜野果充饥。而今的阿佤人早已告别了那个愚昧落后的年代,跟着全国人民一道走进了新时代。

来的路上,我在宁洱县民族团结园,见到那里建有牌坊大门、古式六角碑亭、仿古彩绘主大楼等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块由48位少数民族同胞,代表26个民族,分别以傣文、拉祜拼音和汉文签名的民族团结誓词碑。这块立于1951年元旦的石碑素有“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之誉。他们曾代表普洱区各族同胞郑重地于此歃血盟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这个盟誓缘于此前三个月,普洱少数民族代表受邀进京参加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典。1950年10月1日,他们在天安门左侧观礼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看到了陆海空三军的阵容,看到了天安门广场欢乐的海洋。这一切都让代表们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强大和温暖。最令他们难忘的是,10月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来京的少数民族代表。代表们争相捧出本民族最珍贵的礼物献给毛主席,佤族头人拉勐也献上了三代祖传的梭镖。毛主席拉着拉勐的手说,听说佤族人“猎头祭谷”的习俗,可不可以不砍人头,用猴头来代替呀。拉勐回答说,用猴头不行,用虎头倒可以,但老虎不好抓。毛主席说,这事由你们民族自己商量着办吧。后来佤族响应了毛主席的倡议,改用牛头举行祭谷仪式。这次,我来到西盟勐梭龙潭,同行的普洱作家谢玉兰指着龙潭湖对面的山峦告诉我,“在那边山上,如今还挂着几千颗牛骷髅头呢。”

我听后良久沉思:刚才在勐梭大街上,我见到一个佤族老人在林荫道行

走,他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吹着竹制的竖吹乐器,曲调悠扬。虽说我不知他用什么乐器,也听不出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但我从他幸福的脸上,从那优美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阿佤人的惬意生活。

三

那天,我们一行踏着晚霞的余晖,走进了勐梭龙潭,看了一场民族味十足的佤族舞蹈。开场的舞蹈就是《阿佤人民唱新歌》。随着乐曲奏响,我从热力四射的佤族姑娘和小伙子们的舞蹈动作中,感受到了阿佤人身上散发出的粗犷和豪迈。与此同时,我眼前也浮现出白天时,佤山村寨的热烈场景,身着民族盛装的阿佤人敲起长鼓,吹起独笛,献上美酒,用微笑和真诚来迎接远方的客人。那真诚的眼神和甜美的微笑,让我们每个人都为之动容。

有人说,阿佤人是一个会说话时就会唱歌,会走路时就会跳舞的民族。来到阿佤山,我发现每走一步都会踩到跳跃的音符。一旦有音乐响起,阿佤人无论大人,还是娃娃,那优美的舞姿和表演都会让人为之为之。阿佤人迈向了新生活,但他们骨子里,传统的元素还是没有丢掉。那是一种豪放的美,粗犷的美,甚至带有几分原始的美。

来到西盟佤山,我仿佛年轻了几岁,是阿佤人的热情感染了我,是阿佤人的乐观鼓舞了我。《阿佤人民唱新歌》问世半个世纪有余,歌词也有多个版本,但在人们心目中,这首歌,就像阿佤人一样,依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那天,我在一座依山而建的佤寨上,往下眺望,看到山下峡谷深处一片郁郁葱葱,远处一片梯田淹没在乳白色的云雾中,近处一片茶林若隐若现,一条山间小路弯弯曲曲,像一条蜿蜒的小溪从山间流了下来,一直流到山寨的南端。

蓦然,山那边响起歌声,我循着小路看过去,并没有见到人影,听声音是个女歌手,唱的依然是那首《阿佤人民唱新歌》:“茶园绿油油,哎梯田翻金波,哎五彩花开千万朵,千万朵,哎江三木罗……”

由此情此景,我恍然入了仙境。哦,茶园、梯田都历历在目,唯有那五彩的花架、那山中的歌者,还有那阿佤山的音符仍悄然隐匿在云雾山中。当下,我也带着内心涌动的深情哼唱起来:“哎,阿佤人民唱新歌,唱新歌,哎江三木罗……”

迷彩讲堂

汉字是一个生命体。它生根在中华大地上,绵延千载,标识着中华文化的一脉传承,记录着中华民族悠长而富有活力的历史。追寻它的根源,就仿佛是在阅读一部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史。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了解并热爱我们的文字,将更加坚定我们的自信。

汉字是华夏先民的伟大创造

历史演进至夏商周,中华文明跨入了成熟的门槛,并以独特生命活力奔跑向前。佐证这一论断的首要因素就是:这一时期的汉字已经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字体系出现,并充分展示了华夏先民的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智慧高度。

这一时期的汉字,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一是“殷人刀笔文字”甲骨文,一是熔铸于青铜器之上的“钟鼎文”(亦称“金文”)。在已发现的各种汉字资料中,时代最早的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从那时算起,汉字迄今已经有3300多年的历史。

关于汉字起源的最初记载来自战国时代及其后带有传说色彩的有关文献,汉字被定为仓颉所造。《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皆持此论。但实际上,造字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完成于一人,甚至一代之手。华夏先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使汉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不断地孕育、创意、精炼、筛选、改进,一步步找出规律,走出路来。

学者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中说:“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象形文字是汉字创造的“原点”。作为汉字体系的根基,象形字一经开发,根系就不断蔓延,随即以包罗万象之势蓬勃生长,显示出先民对自然、社会等现象的广泛思考和认知。文明肇创,智慧的火花迅速点燃,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感叹于华夏先民的这一伟大创造。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

仅以造字方法论,汉字一开始就包含着阴阳之道、生生之道,观物取象,道法自然,绝非以简单的方法、技巧可概论。“技近乎道”,汉字部首的形成和使用就有这样的高度,始于“技”而归于“道”。其构思的精巧、细腻,思考的长远,周洽,体现出规律而严密的科学精神,是十分智慧的“道”。

数千年来,汉字不断变化、升级、丰富,没有僵化死板的迹象,显然是活力无穷的创造体系。随着先民们的社会生活不断拓展,其认识领域也随之拓展。虽然“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华夏先民却没有陷入治丝益势的泥潭,而是借助对汉字部首的把握使用,提纲挈领,得其旨归,不断推进汉字的广度与深度,将汉字这一智慧系统演绎得越发完备。

我们今天有很多机会亲近、观摩远古的文字遗存。或甲骨、或青铜、或碑石、或竹帛,不论铸诸甲骨金石,还是书诸竹木帛纸,各种文字中无不闪现文明智慧的光辉。汉字随时代发展了数千年,并适应各种情况变化向前演进,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中华文化精神。

汉字,创制于象形,由象形而会意而形声,并沿着表意为主的方向一路演进,滋养出文化的沃土。中国文学在这

汉字的魅力

■ 刘 娟

方沃土中扎根萌芽、散枝蔓叶、开花结果。其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学在汉字的一笔一画中打下基石、建起殿堂。此后,中华文脉几千年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汉字引领我们穿越时空长河、普通方言隔阂。

中国绘画历来追求写意传神,后来更是讲究诗书画印的交融,并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价值追求,其实质也是依赖汉字独特不凡的魅力。

汉字虽古 其命维新

华夏先民农耕数千年,从自然的循环往复中学习积淀智慧、规律。汉字始于象形,尔后指事、会意,一笔一画、一字一形都显示出细致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字与字之间的逻辑联系也自然明晰;及至形声字,汉字造字的精义奥妙成熟完备,并展现出交融演进的无限可能。

回看汉字的历史,几千年间出现并留存于字典中的字数约为56000多字,不可谓不多;但现代汉字常用字不过4000字左右。一部73万多字的《红楼梦》,仅用4400多个不同单字就洋洋洒洒地写来,这是何等器宇、何等的智慧?我们不禁要问,这里是不是还有更多需要参悟的玄机?可以自信地说,汉字不仅有其生长发达的基因,也有自我更新、保持年轻的基因。

汉字有着与时俱进的适应力;有与新时代、新技术对接融洽的包容性和应变能力。可以看到,在信息时代、智能时代,表音文字的方阵之外,汉字以表意文字的独特面貌与之共存,智慧而迥异,古老而年轻,越发显得活力四射。

汉字研究是十分古老的课题,又是十分新鲜的探索。殷墟甲骨的发现开启了汉字研究的新领域。据统计,目前已发现的所有甲骨文的字数约为4500个,已解读近一半。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化,这些文字资料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中华文化史的华彩篇章。

汉字是华夏先民的文化创造,是高度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因此,汉字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其本身说文解字的文字学研究,更具有丰富深刻的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价值。它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文化意识,乃至感情气质等,可谓博大精深,气象万千。

兵 漫

多彩的课余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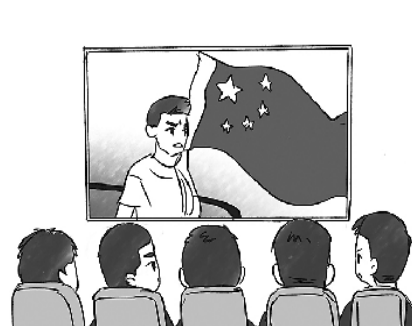
■ 段玉洋



训练间隙高歌一曲。



篮球场上大显身手。



俱乐部里佳片有约。



烧烤晚会别有滋味。

艺海一得

表面看来,武学与书法似乎并无关联,然而在书法的字体审美和书家风格上,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武学的影响。

东汉崔瑗《草书势》以“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来形容草书,其中就隐含着“武”的意味。其后,西晋成公绥又用“直刺邪掣”“劄衫夺节”等语来形容隶书,武学意味就更加清晰。到了唐代,张怀瓘《书断》又以“交戟横戈”“摧锋剑折”等语来形容八分书、隶书。可见,在对字体审美的认识中,武学的影响是明显的。

在对书家风格特征的认识中也时见武学视角。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韦诞书法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萧子云书法如“荆柯负剑,壮士弯弓”。这种对书家风格的描述手

法,后世一直沿用。

书法是艺术实践活动,书法技法层面的一条线索是字的结构与点画。

武学影响在字的结构上,主要体现在形、意、理等方面。汉蔡邕《笔论》:“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指出书法在结构上的技法要求,即必须有生动的形象感,其中就包含武的形象;王羲之《书论》中说,“凡作一字……或如壮士佩剑,或似妇女纤丽”,以武的形象代指壮美。

作为书法最小的造型单位,点画也有武学的渗透。如欧阳询在《八诀》中指出,“折”要如“万钧之弩发”,“撇”要

如“利剑截犀象之角牙”,将点画的书写技巧引向了武学路径。

书法技法的另一条线索是用笔和取势。王羲之《说》“御笔则峰烟云起,如万剑之相成”,董其昌讲“用笔如太阿割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势是潜在的运动状态,是形的精神所在,其核心是虚实相生,这与武学是一致的。康有为也通过武学解释了取势的逻辑,其《广艺舟双楫》云:“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

清包世臣对书法与武学的相关性

| 阅图

天降奇兵

■ 摄影 余海洋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武警特战队员进行下滑训练时的场景。画面中,两名特战队员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从高楼下滑。拍摄者巧妙利用环境光线,把特战队员与映照在墙上的影子融合在一起,从而更加突出了人物主体。楼的边缘线与特战队员手中的绳索、攀登楼与快速下滑的特战队员,在造型上构成对比,直线与曲线碰撞,静态与动态结合,让整幅作品更具有美感。

(雷晓红)

书法艺术与中华武学

■ 李永忠

如“利剑截犀象之角牙”,将点画的书写技巧引向了武学路径。

书法技法的另一条线索是用笔和取势。王羲之《说》“御笔则峰烟云起,如万剑之相成”,董其昌讲“用笔如太阿割截之意,盖以劲利取势”。势是潜在的运动状态,是形的精神所在,其核心是虚实相生,这与武学是一致的。康有为也通过武学解释了取势的逻辑,其《广艺舟双楫》云:“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

清包世臣对书法与武学的相关性

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意见。其《艺舟双楫》云,“言武事似于书道无涉,不知使枪棒者皆有指法,力聚指则气上浮,故无重步法。予尝自题《执笔图》曰:全身精力到笔端,定气先将两足安”,力注笔端的前提是双脚的稳定,这正是从“使枪棒者”在指法与步法的配合上得到的启迪。又云“学书如学拳”,这是关于书法与武学关系的明确阐述。此外,包世臣还讲解了从学拳那里可以学到何种书法技法。

书法是汉字形象向审美方向的推进,武的形象是阳刚醒目而富于美感的,所以才会引起历代书家的重视。